

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与穆斯林兄弟会*

蔡伟良

摘 要: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其 8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几经沉浮, 现已成为当前埃及境内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 并将对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的政局走向、社会转型产生巨大影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研究不能囿于惯性思维而将其视为“激进组织”, 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还原其历史真相, 特别是要看到该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对自身“激进思想”的修正, 从而对它有更加全面、公正的认识。

关键词: 埃及; 穆斯林兄弟会; 哈桑·班纳; 后穆巴拉克时代; 社会转型

作者简介: 蔡伟良,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 (2012) 01-0010-12 **中图分类号:** D829.14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属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年校级规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受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研究项目和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2 项目资助。

一、哈桑·班纳和早期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 1928 年, 其创始人和第一时期的领袖是哈桑·班纳。最初该组织的活动区域仅局限于其创始地——埃及的伊斯梅利亚。1932 年, 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首都开罗建立了第一个分会, 此后, 穆斯林兄弟会亦将其总部迁至开罗。哈桑·班纳于 1927 年毕业于埃及著名学府——知识学院 (دار العلوم), 毕业后即定居伊斯梅利亚, 并与哈菲兹·阿卜杜·哈米德、艾哈迈德·哈绥里、祖阿德·伊卜拉欣等共同创

建了穆斯林兄弟会（下文简称穆兄会）。

穆兄会最早的建会宗旨是“以爱、以兄弟情谊为基础传播伊斯兰教”。以哈桑·班纳为首的穆兄会创建者实际上是一批传统主义者和保守派学者。他们认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埃及，埃及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并大有去伊斯兰化、逐步西方化的隐患。面对伊斯兰社会中出现的“异样”，面对伊斯兰信仰可能被削弱，穆斯林学者有责任捍卫伊斯兰的纯洁，有义务为建立以伊斯兰法为核心的伊斯兰社会而奋斗。而创建穆兄会组织之首要目的，就是为了捍卫伊斯兰教的纯洁。为此，哈桑·班纳等人为穆兄会组织制定了基本信条：基于伊斯兰教的泛适性，伊斯兰不仅仅是宗教，而且是一种生活模式，因此，伊斯兰教不仅仅规范信仰，指导信仰者的精神生活，号召礼拜、功修，伊斯兰教还意味着国家的建立，意味着奋斗与圣战；正宗的伊斯兰教已被搅乱，为此，必须让伊斯兰教回归本源；主张泛伊斯兰化，伊斯兰是一种信仰，也指国家。因此，全体穆斯林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伊斯兰国家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上述三个信条的基础上，坚持哈里发制度、建立伊斯兰政府是穆兄会的目标，穆兄会所有的努力都将以此为目标。

从这些基本信条中可以看到，穆兄会在建会初期，是以打着捍卫伊斯兰教的纯洁为旗帜的，虽然仅仅有五条，且文字不多，但不难看出其间的逻辑关系：承认伊斯兰教的泛适性，承认伊斯兰教已被搅乱，在此基础上认识伊斯兰教回归本源的必须性。其核心思想是：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且还是应该通过建立国家来予以规范的一种生活；受到异教影响而出现偏斜的伊斯兰教必须回归正道——坚持哈里发制度，建立以伊斯兰法为核心的社会。

据史料记载，穆兄会在成立初期并没有过多介入政治，只是借助哈桑·班纳创办的《穆斯林兄弟》杂志宣传其理念，试图通过加强青年之间的沟通，以教育和宣传等温和手段实现社会改良，从而使伊斯兰价值观深入人心，为此穆兄会还呼吁当局遵循伊斯兰教原则从事国家管理，呼吁当时的法鲁克国王能“为穆斯林而高举伊斯兰之旗”^①。

恐怕连哈桑·班纳以及他的伙伴们也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为穆兄会制定的这些组织信条居然很快得到社会底层民众的广泛响应和支持。穆兄会在短短几年内得到迅速壮大，至1938年，即穆兄会成立后的第十年，

^① [埃及]哈桑·萨迪克：《伊斯兰思想之源》（阿文版），开罗：埃及图书总局1997年版，第236页。

该组织在埃及境内已经拥有 300 多个分支机构。也正是在这一年，穆兄会出版了属于该组织的官方刊物《向导》周刊，并借该杂志创刊号社论第一次公开表明了穆兄会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政治诉求，强调“伊斯兰是一种广泛的意识形态，它有能力创建一种能为它的信仰者规范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制度。”^①

应该承认，穆兄会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完成向一个政治组织的转换过程，与外界社会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武装起义反对英国托管、反对犹太殖民的强烈呼声有关。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军事入侵、反对西方文化蚕食方面，穆兄会的态度一直是非常坚决的。而正是这样的态度，不断为穆兄会登上政治舞台赢得了声誉，穆兄会于此时登台亮相可谓“水到渠成”。

随着队伍的扩大和活动的日益频繁，穆兄会的政治诉求也日渐明朗，对此，哈桑·班纳曾对穆兄会的使命予以如下定义：穆兄会所进行的运动“是赛莱菲耶使命的继续，是逊尼派道路的继续，是苏菲派所追求的真实之延续；同时穆兄会还是一个政治组织，是一个体育团体，是一个学术机构，是一个经济工程，是一种社会思想。”^②从穆兄会的发展历史来看，哈桑·班纳的这一表述形成了穆兄会从一个群众性组织向一个有着完整意识形态支撑的政治组织转变的标志。

根据哈桑·班纳对穆兄会使命的定义，自 20 世纪四十年代起，穆兄会除了继续保持其贫民组织这一特性外，还开始以一个政治组织的架构予以运作，并确定了所谓“圣战政策”，成立秘密机构，不惜以暴力手段实现既定目标。据史料记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穆兄会的总人数已达到 45 万。另外，自 1937~1947 年，仅用十年时间，穆兄会的秘密武装组织人数就已高达 75000 人，每年用于与军事、情报相关的开支达 5 万埃镑。当时，埃及几乎所有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里都有穆兄会成员。

穆兄会在其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确实有过暴力行为，其首次暴力行动发生在 1945 年，起因是当时的内阁总理艾哈迈德·麦希尔在埃及议会上公开反对哈桑·班纳及其他五名穆兄会成员参加埃及议会议员选举，艾哈迈德·麦希尔的这一态度，立刻引起穆兄会的义愤，一名叫迈哈默德·阿伊赛韦的穆兄会成员于 1945 年 2 月 24 日乘艾哈迈德·麦希尔离开议会

① [巴基斯坦]德里布·希罗：《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阿文版），阿卜杜·哈米德译，开罗：埃及图书总局 1997 年版，第 119 页。

② [巴基斯坦]德里布·希罗：《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阿文版），阿卜杜·哈米德译，开罗：埃及图书总局 1997 年版，第 119 页。

大楼时将其击毙。^①尽管凶手并没有承认自己是穆兄会成员，但事后调查证明，他确实是穆兄会的核心成员之一。

由于在参政上受到挫折，穆兄会开始更加注重打造自己的政治形象，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问津政治，他们不仅经常组织各种大型会议讨论社会问题，甚至还公开组织学生举行集会。但由于穆兄会在政治理念上与埃及政府相去甚远，且宗教色彩较浓，又有暴力倾向，自 20 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该组织与埃及政府之间的矛盾就一直存在。

二战后，以色列的建国遭到全体阿拉伯国家的一致反对，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穆兄会正是利用了这次机会，不仅高举“圣战”大旗，积极参与了这场反对以色列的战争。而且，还在“圣战”的名义下，公开且合法地拥有了武器。在战场上，穆兄会成员的高昂士气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得到了政府军官兵的充分肯定，从而使穆兄会的影响在埃及军队中迅速传播与扩大。^②

然而，也正是穆兄会成员在战场上所展现的反犹激情，使他们一度忘乎所以，竟将反对犹太人的行动从战场引入城市，引入首都开罗。在开罗许多犹太人的产业遭到穆兄会的袭击。同时，为表示对英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愤怒，在开罗的英国人也遭到穆兄会的枪杀。为此，埃及当局不得不再次对穆兄会采取强硬措施，大批穆兄会成员被拘捕，并被起诉甚至审判。

由于和政府不和，穆兄会的生存环境一直很困难，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草根型”的组织，穆兄会在民众中却拥有坚实的基础，尤其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穆兄会在百姓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已远远超过政府，在一些穆兄会占有的规模较大的城镇，几乎已形成由穆兄会主导的“独立王国”，所有这些都对埃及政府构成极大威胁。为此，1948 年 12 月 8 日，埃及诺克拉希政府下令取缔穆兄会，没收其财产，拘捕其成员。就在政府颁布此法令后的第 20 天，为报复政府，穆兄会再次采取暴力行动，于 12 月 28 日将诺克拉希击毙，但穆兄会也为此次行动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1949 年 1 月 12 日，作为对穆兄会刺杀诺克拉希的报复，埃及政府成功策划了刺杀穆兄会领袖哈桑·班纳的秘密行动。

① [埃及]哈桑·萨迪克：《伊斯兰思想之源》（阿文版），开罗：埃及图书总局 1997 年版，第 236 页。

② 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思潮与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2 页。

二、穆斯林兄弟会和赛义德·库特卜的《路标》

哈桑·班纳的遇害，成为穆兄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穆兄会从此陷入低潮。直至 1952 年埃及革命，穆兄会与埃及自由军官团联手行动，一举推翻了埃及法鲁克王室政权。穆兄会认为，此次埃及革命的成功，穆兄会是主要参与者，有权分享胜利成果。阿卜杜·纳赛尔出于无奈，同意穆兄会推荐三名成员入阁，但由于穆兄会内部存在分歧，最后并未派员入阁。在失去了这次合法参政的机会之后，穆兄会只能作为埃及政府的反对派而存在。穆兄会与纳赛尔政府的相互理解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两年之后（1954 年）穆兄会因涉嫌参与暗杀纳赛尔而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由此穆兄会再次进入低迷时期。

由于 1954~1971 年穆兄会是作为一个非法组织而存在的，因此，它所进行的任何活动都有可能遭到政府的监控。正是在这样危机四伏的状态下，穆兄会各种暴力、非暴力的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因为是非法组织的暴力活动，它被带上“恐怖”帽子，甚至被“妖魔化”是极其自然的。穆兄会虽然在这一阶段处境十分困难，但作为一个组织的价值取向、理论依据却日渐成熟，其标志就是被誉为穆兄会继哈桑·班纳之后的第二大思想家、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卜^①的重要著作——《路标》的诞生。

《路标》是赛义德·库特卜在狱中完成的一部具有说教布道性质的著作，全书除“序言”外一共 12 个章节，包括《古兰经》造就的精英代、古兰之道的本质、穆斯林社会的产生及其特色、为主道而奋斗、除安拉外，绝无他主——人生之道、宇宙法则、伊斯兰就是文明、伊斯兰文化观、穆斯林身份及其信仰、深远的变革、信仰的升华、这就是路等内容。

曾经被穆兄会视为该组织“宪章”的《路标》，通过上述 12 个章节的论述，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建立伊斯兰社会的必要性。赛义德·库特卜认为，现今（指当时）社会已游离了由安拉制定的社会法则，且人类社会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而唯一能拯救人类于此灾难的就是伊斯兰教。建立穆斯林社会（伊斯兰社会）就是“出路”。赛义德·库特卜认为，当今世界虽然拥有巨大的财富，也不乏物质化的高端发明，但从这一社会

^① 赛义德·库特卜（1906~1966 年），1948 年获政府奖学金赴美攻读教育学，20 世纪五十年代穆斯林兄弟会主要领导之一，1954 年因涉嫌参与谋杀纳赛尔被判十年徒刑，1964 年出狱，八个月后又因谋划推翻政府罪入狱，1966 年被判死刑。

的性质来判断，它依然如同伊斯兰教诞生前的蒙昧社会。蒙昧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安拉的权威受到侵犯，特别是属于安拉神性之一的统治权受到严重威胁，甚至被人篡夺。赛义德·库特卜如此界定现实社会，其根本目的是为“构建伊斯兰政权的必要性”鸣锣开道。他在《路标》的“序言”中不惜笔墨将西方式的民主和东方的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以引出他的“精辟论断”——“人类必须有一种，而且只能有一种全新的领导。”毫无疑问，他的所谓“唯一的全新领导”就是伊斯兰“乌玛”^①。显然，赛义德·库特卜借用“乌玛”一词为它的“穆斯林政权”释意，强调“伊斯兰‘乌玛’的历史使命已经到来”^②，而且还指出，伊斯兰“乌玛”必须加以重建，只有这样，伊斯兰才有可能重新领导全人类。

赛义德·库特卜毕竟接受过西方教育，对西方物质文明并未全盘否定，如他在“序言”中所言，“西方科学家已经构建完成了巨大的‘科学文化’”，“西方人在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只有在建立起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人类信仰共同体（即伊斯兰‘乌玛’）”这一平台，西方的物质文明才可能得以有效保护，更好地发挥其为全人类服务的职能。

不难看出，作为一个伊斯兰教的激进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在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的现实面前已经“与时俱进”了，已不再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具有赛莱菲耶倾向的伊斯兰思想家那样一味要求以伊斯兰初期的社会形态为模式实现社会重建。显然，这种“与时俱进”是能赢得民心的，而且其核心思想也没有偏离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为该组织所制定的基本信条。

“现行社会已经被蒙昧主义所笼罩”，这是赛义德·库特卜思想原点，在《路标》第一章“《古兰经》造就的精英代”中，他认为，“在与蒙昧主义较量的过程中，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乃至牺牲。”那么如何实现变革社会的最终目标呢？赛义德·库特卜设计的途径是，回归原始文本《古兰经》，像伊斯兰教第一代精英那样，从原始文本中汲取营养，而不是从第二手、第三手类似“注释本”、“解读本”中寻找理论依据。在他看来，除了原始文本，其他资料都已经受到非伊斯兰色彩的污染。他要求穆斯林以第一代精英为楷模，首先实现个人的自

① “乌玛”是阿拉伯语译音，本意为民族，引伸为社团、公社。学界用以专指早期有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穆斯林政权。参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7页。

② 本文中所涉及《路标》一书中的内容，均来自网址：[www.http://daawa-info.net](http://daawa-info.net)。

我改变——使改造社会成为自觉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最终目标——把与伊斯兰生活道路、伊斯兰世界观格格不入的各种现象彻底铲除。

实现社会的变革，必须从《古兰经》中寻找路径，在《路标》的第二章“古兰之道的本质”中，赛义德·库特卜再三强调，古兰之道的核心是“万物非主，惟有真主”，而且这一核心也是构成伊斯兰价值判断的基石以及穆斯林行为和道德的指南。赛义德·库特卜还对“万物非主，惟有真主”作了延伸性解读，即“人类所有事物的统治权全归安拉所有”，凡侵占了这一权利的人都将驱逐。他甚至要求穆斯林将这一理念铭记在心，并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实践予以体现。值得一提的是，赛义德·库特卜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家，而且还非常注重将理论付诸于行动，他告诫人们，不能将对伊斯兰本质的研究与对它的社会实践割裂开来，尤其是他拒绝将以“认主惟一”为核心的伊斯兰思想仅仅视为一种文化意识，而倡导伊斯兰思想应该更多地体现在群众当中，体现在实实在在的组织中间，体现在现实运动之中的运作理念上，使以《路标》为宪章的穆兄会所开展的所有活动都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都可被视为为实现其最终目标而进行的必要的“社会实践”。

“为主道而奋斗”是《路标》中最为冗长的一个章节，也是《路标》的“聚焦点”。作者在论证了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变革、穆兄会的最终目标，并呼吁“行动”和“实践”之后，赛义德·库特卜更是不惜笔墨大谈为主道而奋斗的意义。在这一章节中，作者再次强调了他所认为的伊斯兰教的使命——“伊斯兰教是解放全人类，使人类摆脱人奴役人的总宣言”。而实现这一使命的前提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落实安拉的“绝对统治地位”。这就意味着将对人类社会“不同形式、各种体制下的世俗政治和社会形态进行全方位的革命”。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可能“坦途”，就需要“圣战”。在谈到“圣战”时，赛义德·库特卜并没有刻意回避“武力圣战”，在他看来，圣战必须是“宣传”和“行动”并举，乃至存在“用武力进行圣战行动的必然性”。赛义德·库特卜甚至认为，鉴于“伊斯兰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的信仰，或某个国家的制度”，而“是针对全世界、全人类的制度”的，因此，伊斯兰有权主动出击，有权先发制人。在赛义德·库特卜眼里，如果将伊斯兰仅仅看成是一种信仰，那是对伊斯兰的误读，伊斯兰的本质就是构建体现安拉统治地位的社会，“至于信仰，则是另一个问题，它可以在清除了所有影响力之后，在总制度的保护下，让人们自行作出选择。”从这一点上来看，赛义德·库特卜的“为主道而

奋斗”已经超越了宗教布道层面，更像一篇战前动员演说辞。

通过《路标》序言和前四章的论述，赛义德·库特卜阐明了他对当今社会性质的认识，同时也回答了伊斯兰出路在哪里、伊斯兰社会治理原则、作为一个穆斯林应该如何应对等敏感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他以上述问题为核心，分别就伊斯兰宇宙观、文化观、穆斯林身份和信仰之关系等予以了阐述和解读，从而较完整地展示了他所认为的正宗的伊斯兰价值取向及其意识形态。

虽然赛义德·库特卜并没有担任过穆兄会的总训导师，但作为这一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作为一名思想家，《路标》的问世对正处于低迷时期的穆兄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他的一整套伊斯兰复兴主义的激进理论一度还成为该组织中激进分子的行动指南。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20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更为激进的小团体，如‘圣战者组织’、‘赎罪与迁徙’等则从穆兄会中分离出来，形成更为极端的势力”^①。此后，穆兄会或其他与穆兄会有关的激进组织所策划和实施的暴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被视为是受《路标》影响的结果。更为严重的是，穆兄会中的部分成员因“武力圣战”行为而被打上了“激进组织”的标签。

三、20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穆斯林兄弟会

20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穆兄会经历了萨达特时代和穆巴拉克时代的度沉浮，历经磨练，乃至成为埃及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

七十年代初期萨达特上台后，穆兄会在埃及的处境就得到了改观。萨达特素以虔诚闻名，他上任后的举措，如下令国家电视台和电台每天必须五次按时播报招祷宣礼，承诺沙里亚（伊斯兰法）成为国家法律的主要依据，释放被关押的穆兄会成员等迅速改善了政府和穆兄会的关系。由于萨达特宽松的宗教政策，埃及国内在七十年代初宗教气氛浓郁，伊斯兰传统主义甚嚣尘上，甚至还影响了大批青年学生，被穆兄会奉为至上的伊斯兰价值观也被社会精英阶层广泛接受。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大批先前提居沙特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穆兄会成员纷纷回到埃及，从而使埃及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得以迅速扩充和加强。

1973年十月战争之后，萨达特在国际上推行的外交政策和在埃及国

^① 张铭：《现代化视野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内推行的经济政策都与以原教旨主义为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的价值观念相去甚远，从而引来了包括穆兄会在内的许多宗教组织的诟病和抵制，而原本穆兄会中所谓的温和派因与政府关系过于密切，也开始在自己的组织中丢失了民心，其号召能力和权威性被大大削弱。1979年，萨达特代表埃及政府在美国戴维营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进一步激起了包括大批青年学生在内的埃及民众的极大不满，由穆兄会温和派掌控的《号召》杂志也公开发表文章，谴责政府不顾民意，与以色列媾和。由于在这一问题上与政府大唱反调，穆兄会（包括温和派）再次受到政府打压，不仅大批激进分子被政府关押，而且还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号召》杂志也被取缔。萨达特与包括穆兄会在内的宗教组织的不和，终于导致萨达特本人被刺的惨剧。

1981年，穆巴拉克接替被刺杀的萨达特就任总统。在登上总统宝座之初，穆巴拉克并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如何施政。因此，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他都基本延续了萨达特的执政理念。然而，面对埃及国内包括穆兄会在内的众多宗教组织，穆巴拉克在总结前任总统萨达特执政后期所采取的强硬政策的利弊、得失之后，决定采取“区别对待、软硬兼施”的灵活策略，即对宗教组织中的温和派以拉拢、利用为主，而对其中的极端分子则采取高压态势。穆巴拉克的这一“拉拢、打压并举”的措施应该说是奏效的，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政府和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进一步分化了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中就已出现分歧的穆兄会内部组织，在这一大气候下以温和派为核心的穆兄会也不止一次宣布“放弃暴力”，并“倾向于在要求更大民主化、政治代表权和尊重人权的背景下来表达他们的批评和要求。”^①1973~1986年在位的穆兄会总训导师泰勒迈萨尼，就曾多次表示要通过议会斗争改变社会。1984年穆兄会与新华夫脱党合作，第一次参加埃及议会选举，有8名穆兄会成员成功进入议会。

20世纪九十年代，穆兄会因涉嫌参与暴力再次遭到来自穆巴拉克政府的打压，期间两次参选都被设置了障碍。2000年之后穆兄会通过调整策略再次与政府修和，终于在2005年的议会大选中赢得佳绩，其成员作为独立参选人成功当选的竟高达88人之多，占议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真正成为埃及最有实力的反对派。

① [美]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曲洪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四、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与穆斯林兄弟会

穆巴拉克黯然离开总统宝座之后，谁将在年内埃及大选中胜出，并成为大动荡之后的新领袖一直是备受世界关注的中东头等大事之一。事实已经证明，具有鲜明宗教色彩，且曾经被西方判定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穆兄会有着明显的优势。笔者认为，对谁当埃及下任总统的猜测并不具有很大意义，因为无论是穆兄会或是其他组织当政，穆兄会作为埃及当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都会对埃及日后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治国方略产生巨大影响。鉴此，对穆兄会发展历史的研究，对该组织所奉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它所希冀的国家模式、社会形态的分析和研判就显得尤为重要。

有学者认为，“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一大推动者也许当推埃及的哈桑·班纳”^①，而由哈桑·班纳创建的穆兄会就是现代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有相对较完整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它自成立以来历经 80 多年坎坷，从最先的“草根型”贫民组织到曾经的“激进暴力组织”，再到今天的埃及政治舞台上最有实力的反对派。这不可不视其为在特定条件下民间组织发展壮大成功案例之一。必须指出的是，无论该组织以哪种身份存在，它的属性却始终未变，那就是，穆兄会是当今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规模最大的宗教组织。而其影响则几乎遍及所有伊斯兰国家。虽然，由于该组织倡导伊斯兰复兴而被贴上了“原教旨主义”的标签，同时也因为该组织曾经有过的暴力行为，它的口碑一直欠佳。然而，无论如何，后穆巴拉克时代，它将在埃及的政治舞台上更加有所作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无论穆兄会是否掌权，它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特别是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 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埃及是否还会如同穆巴拉克时代那样继续成为美国的盟友？或因为埃及未来政府执政理念的彻底改弦而成为西方眼里又一个伊朗？

2. 与以色列的关系。穆兄会在对待以色列问题上一直态度坚决，从根本上反对埃及和平协议。如穆兄会前任总训导师穆罕默德·迈赫迪·阿基夫就曾表示：在对待以色列这一问题上穆兄会态度是坚决的，没有讨论的余地，“穆兄会认为，以色列充其量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载体，它侵

^① 张铭：《现代化视野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6 页。

占了我们神圣的、伊斯兰的、阿拉伯人的领土，它是建立在鲜血之上的。我们终将把它清除干净。”^①可以预料，后穆巴拉克时代，埃以关系很可能进入“冰封”状态，甚至还会摩擦不断。

3.与伊朗的关系。埃及和伊朗虽然都是伊斯兰国家，但由于所属教派不同，同时在对待以色列问题上伊朗和埃及也各执一词，以致双方关系一直紧张。后穆巴拉克时代，在穆兄会的影响下，今后两国关系恐怕会有所改善（埃及动荡期间，伊朗军舰被允许通过苏伊士运河就已经对此作出了说明）。

4.国家体制改革。按常理分析，即便由穆兄会组建的自由与公正党在大选中胜出并组阁，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对埃及现行体制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革。但穆兄会毕竟是一个具有明显宗教色彩，且倾向于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组织，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它虽然已经对其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回归伊斯兰”的宗旨，对其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路标》以建立伊斯兰政权、全盘否定现行社会体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提出了与时俱进的修正，不过，该组织中“铁杆派”的势力也不可小觑，一旦保守派势力抬头，如得不到有效安抚，宗教干涉政治将不可避免。甚至出现“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又一个伊朗模式也不是没有可能。

5.社会文化构建。社会文化具有普世性特质，是意识形态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旦“回归伊斯兰”、“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终极目标被确定，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在内的社会文化现状将被重新审视，社会形态、文化表象的宗教化势在必行。

总之，埃及的社会转型不仅关乎埃及本身，它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既定模式而对其他阿拉伯国家产生影响，它必将对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格局带来影响。是利益在先，还是意识形态在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来说确实面临着这一尴尬的选择。

五、结语

从近代开始，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埃及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埃及对阿拉伯各国的影响也不会因为此次变革而被削弱。因此，对变革成功后的埃及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将会发生什

^① 参见“穆斯林兄弟会在线”，<http://www.ikhwanonline.com>，2011年7月6日。

么样的变化令世人关注。在历经数月的埃及动荡过程中，穆兄会确实表现低调，然而正是它的“低调策略”和本已拥有的强大群众基础使它赢得了更大的声誉。正如上文所说，穆兄会是否掌权已经不重要，关键是如何来界定现在的穆兄会。穆兄会在其发展的历史上确实有过激行为，尤其是《路标》宣扬的“武力圣战”思想确实应该被彻底摒弃，那么它不光彩的过去是否影响犹在？尤其是《路标》思想是否还会被奉为该组织的指导思想？参政的自由与公正党是否真能做到不受其母体组织——穆兄会的影响而独立运作？这些问题才是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笔者认为，对穆兄会的研判，不能囿于惯性思维而将其视为“激进组织”，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观点，尽可能还原该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真相，分析该组织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原因，乃至对它所宣扬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政治思想等有一个较为客观、公正、全面的认识。另外，在对待因穆兄会影响，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社会可能出现的转型等，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Egypt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CAI Weiliang

Abstract Egypt's Muslim Brotherhood is the world's most renowned religious organization. In its 80 developing years, it faced ups and downs and has become the most influential political force in Egypt. In Egypt era after Mubarak, it will have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direction and the Egyptian society's transformation in Egypt. Our study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can not be confined to the inertia of thinking, regarding it as a "radical organization". We'd better follow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ethods to restore its historical truth, particularly to see its own amendment in "radical ideas" during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Thus we can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just understanding to it.

Key Words Egypt; Muslim Brotherhood; Hassan Banner; Post-Mubarak Era in Egypt; Social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杨 阳)